

## 梁啟超（西元一八七三—一九二九）

鄭世興

### 一 管教嚴格的家庭

梁啟超先生字卓如，別號有任公、滄江、中國之新民及飲冰室主人等。廣東省新會人，出生在前清同治十二年（西元一八七三年），民國十八年（西元一九一九年）逝世，死時五十六歲。

梁氏的先祖是由中原向南方逃亡的難民，曾經遭受宋明亡國的痛苦。在他曾祖父以前，世代耕田，勤樸地過日子。他祖父名鏡泉，是一位秀才；祖母名黎。他父親名蓮澗，也是一位秀才，在鄉里教書，平時常為鄉人排難解紛；母親趙氏，非常賢慧。

梁氏幼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接受的，他的祖父、父親和母親都曾教他讀書。父親對他的管教很嚴，他的言語舉動如稍不規矩，即遭受責罵；當他十二歲考取秀才時，他的父親仍然要他操作勞役。母親生性溫良慈愛，不過對他的督促也很嚴厲，不但教他讀詩書，而且教他做人的道理。梁氏在「我之為童子時」一文中，曾追述他六歲時因說謊被責的情形說：



「……我家之教，凡百罪過皆可饒恕，惟說謊斷不饒恕。我六歲時不知為何事忽說謊一句，……不久即為我母發覺，……當時被母翻伏在膝前，力鞭十數，我母當時教我之言甚多，但記有數語云：『汝若再說謊，將來便成竊盜，便成乞丐。』我母旋又教我曰：『凡人何故說謊，或者有不應為之事而為之，畏人之責其不應為而為也，則謊言吾未嘗為。或者有必應為之事而我不為，畏人之責其應為而不為也，則謊言我已為之。夫不應為而為，應為而不為，已成罪過矣，若己不知其罪過，猶可言也，他日或自能知之，或他人告之則改焉不復如此矣。今說謊者則明知其罪過而故犯之也，不惟故犯，且自欺欺人，而自以為得計也。人若明知罪過而故犯，且欺人而以為得計，則與竊盜之性質何異，天下萬惡皆起于是矣。然欺人終必為人所知，將來人人皆指而目之曰，此好說謊話之人也，則無以信之。既無人信，則不至成為乞丐焉而不止也。』我母此段教訓，我至今常記在心，謂為千古名言。」

由此可見母教對他影響之深，直到晚年還感念不忘。

梁氏的祖父不僅教他讀書，而且常拿古時聖賢豪傑的言行勉勵他，對於宋明亡國的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更是不厭其詳的講解給他聽。像「崖山遺恨」、「揚州十日」、「嘉定屠城」等反清的歷史，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熟悉了。

## 二 勤勉不懈的治學

梁氏聰慧過人，求知慾特別強烈，從小便勤讀不懈。他六歲時便讀完四書，八歲讀完五經。年幼的時候，因家貧買不起書，家裏只有史記和綱鑑易知錄兩部書，他幾乎每天都讀，差不多全部可以背誦。光緒二十一年，京師強學會成立，會中購有很多西書，他也幾乎全部都瀏覽過。民國七年他去歐洲考察，在船上五十天看完兩大箱近一百冊的日文書籍，由此可以看出他勤讀的程度。他為了想看懂西書，曾努力學習英文，在四十多歲漫遊歐洲時還跟好友丁在君學習英語。

他常因講學和著述，廢寢忘食，甚至影響健康；民國七年春夏間，曾摒棄百事，專心於中國通史的著述，數月之間寫成十餘萬字，以致患病吐血多時，通史的著述因此停頓。他到了晚年，仍然致力於著述，毫不懈怠；去世前夕，臥病在北京協和醫院，還在趕寫未完成的著作，其勤勉治學的精神實屬罕見。據估計，他一生一共寫了一千四百多萬字，平均每月寫三萬字左右。他常一夜之間不眠不休地寫上幾千字，由此也可見其才華之卓越超群。

### 三 正氣凜然的性格

梁氏受了中國傳統的教育，所以具有中國讀書人的性格，正氣凜然，只要是義之所在，即不畏艱險、不屈不撓的去完成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西元一八九八年）戊戌政變以後，慈禧太后的黨人四處抓人。參加政變的康有溥、楊深秀、林旭、楊銳、劉光第等人皆被斬首；其他牽涉新政的人，不是被充軍，就是被革職，或被

監視起來。梁氏當然也是被通緝的要犯，但他在八月六日卻出現在日本使館。他到日本使館並不是去避難，而是自動去赴難的：他以犧牲個人生命為條件，懇求日本公使營救光緒皇帝和康有為，其悲壯之氣感動了日本公使，不但沒有將他送給清廷，而且還幫助他逃亡日本。他在日本時，吳稚暉等人在日本大倡革命，遭到清廷官吏的猜忌，因此清廷請求日本政府遞解吳稚暉等人回國。梁氏一向對吳氏甚為尊敬，他知道這件事以後，曾經氣憤地對清廷大加指責。

民國四年五月袁世凱利用美國人古德諾發表文章，力言共和政體不適宜於中國，中國必須實行帝制；又有楊度、劉師培等人在北京發起組織籌安會，極力擁護袁世凱做皇帝。梁氏深知其中陰謀，就發表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一文，痛罵袁世凱一頓。據說，當這篇文章還沒有發表的時候，袁曾派人送二十萬金給梁氏祝壽，這樣厚重的賀禮不但被他拒絕，而且他還把這篇文章錄下來送給袁看。袁又派人告訴他，大意說：「你亡命已經十餘年了，逃亡的苦味也應該嘗夠了，何必還要自討苦吃？」他卻笑著對來人說：「我過去對逃亡很有經驗，我寧願過逃亡的生活，不願意在混濁的空氣中苟且偷生。」他這種不畏權貴、不受威脅利誘的膽識，多麼令人敬佩！

#### 四 愛國救國的熱忱

梁氏一生熱愛國家民族。他曾說：「愛國兩字，近來當做時興口號，到處有人說起，但細按下去，真能愛國者究有幾人？比起別國人愛國至情，我等真要愧死。」這是何等感慨！他的愛國不僅溢於

言表，而且在行動上表現出來。

他一向被人認為是維新派，其實在光緒二十九年以前，也就是在他三十歲以前，與其說他是維新派，不如說他是革命派。他推翻滿清的革命救國的行動，雖然不像國父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的那樣的轟轟烈烈，但也頗足稱述。在革命行動方面，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以後，曾打算和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黨攜手合作；初步的合作是辦了一種名叫「中國祕史」的雜誌，刊登宋明亡國和太平天國洪秀全、楊秀清的故事。自此以後，他和中山先生的來往日漸密切，甚至有合作組黨的計劃，只可惜由於康有為的從中阻撓，未能成功。

光緒二十五年九月間，他在東京創辦了一所高等大同學校，一時有革命思想的人，都集中在這所學校裏。他對學生鼓吹英法自由平等的學說，鼓舞他們努力革命大業。那時留日學生當中主張排滿最激烈如戢翼翬、沈雲翔等人，也常常來大同學校訪問，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影響力。

民國成立以後，他為了國家的生存更表現了無比的愛國救國行動。在民國四年為了護國討袁曾經好幾次出生入死。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當蔡松坡宣佈討伐袁世凱以後，梁氏即在上海各報發表討袁文字，以等待各省的響應，可是等了三個多月卻沒有動靜，他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，廣西響應的消息來了，陸榮廷派唐紹慧來上海，準備迎接他去廣西；並且說只要梁氏一到，廣西馬上獨立。於是他急著要去廣西，事先和大家約好分途前往，以免被人發覺。他預定先到香港，再由安南偷渡入鎮南關，但不料在上海的住所被偵探包圍，袁世凱捕拿梁氏就地正法的命令早已通行各省。後來他得到日本武官

青木的幫助，才倖免於難。他到香港以後，改乘日本貨船到海防，由日本農場主人深夜以小艇來接，步行了一天，才抵達鎮南關。這次沿途吃盡苦頭，遭遇了許多危險。後來他又冒險前去廣東見龍濟光，終使龍氏就範。護國討袁能夠順利成功，梁氏實在是功不可沒。

民國七年，徐世昌任總統，而大權則操在督辦段祺瑞的手中；段為了要向日本借款，不惜以山東權益讓給日本作為交換的條件。梁氏知道這件事的時候，正是以北京政府特使的身分參加巴黎和會，於是堅決反對這喪權辱國的和約，拒絕簽字。他以一個北京政府派去的特使，為了國家的利益居然敢反對政府的一政策」，這種為國家的大義而不計犧牲小我的風範，深為國人所仰慕與讚賞。

## 五 日新又新的思想

梁氏常受人批評的是他的思想往往前後矛盾，這點他頗有自知之明，不過由此正足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在不斷的進步和求新之中，他自謂「太無成見」、「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」，表現出他始終不落伍而力求趕上時代適應環境。

他的思想可說是一直走在時代的前端，凡西洋各種新思想和學說，只要是合乎時代潮流的，他無不接受而加以提倡。他在光緒二十一年（西元一八九五年），這時他只有二十二歲，就和康有為的學生麥夢華辦了一種小型雜誌，名叫「中外紀聞」，宣傳民權思想。次年，他又辦了一種刊物，名叫「時務報」，提倡民權的言論較前更加激烈。光緒二十二年，他擔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，常在批改學

生的筆記中提倡民權思想。

他又是清朝末年提倡女權極早的一人，在光緒二十二年就已經鼓吹女子教育；他以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，而女子有沒有受教育與國家的盛衰有極密切的關係。他極其反對女子纏足，在光緒二十三年，曾經和汪康年、麥夢華等人在上海創辦了一個「不纏足會」，提倡天然腳；這雖然是小事，但在當時全國相習成風的情形下，這種反傳統的主張，正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新穎。

## 六 科學求真的精神

梁氏的感情非常豐富，他的一生行動始終無法完全擺脫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影響，原因就在這裏。不過，當他的看法和老師大不相同時，他就既不盲從，也不緘默。例如康有為是反對革命的，而梁氏在早年則贊成革命，他並不因為康有為反對革命就不敢和他爭辯，他常引述希臘哲學家的話：「我愛我的老師，但我更愛真理。」這種態度實在就是科學求真的精神。

梁氏雖然不是科學家，但他卻深信科學。民國七年，他到歐洲考察，為了要徹底了解歐洲的實況，在同去的人當中，他還特別物色了一位科學家丁文江（在君）同行。丁氏曾經在英國專攻地質學和動物學，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科學家。梁氏對於西方的科學精神和方法都有深切的認識，他本來就長於歷史，後來更用科學方法研究歷史，創下了史學統計的研究方法，這些都足以看出他對科學的篤信不移。

民國十二年春夏之交，丁文江和張君勱兩人為了人生觀問題而發生爭論，雙方參加的學者達數十人，但由於沒有把討論的前提確定，結果成為一場混戰。梁氏曾為此寫了兩篇關於科學玄學論戰的「戰爭國際公法」和「人生觀和科學」的文章，希望能夠藉此促使他們真正為真理而辯論。他在這兩篇文章的結論裏說：

「我把我極粗淺極凡庸的意見總括起來，是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，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；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，絕對的超科學。」

這種客觀謙虛和審慎公允的態度，又是何等的契合科學精神！

最難能可貴的是梁氏最後竟以身殉於科學。原來他在民國十四年曾患小便出血症，一直找西醫治療，最後竟因西醫錯誤的診斷和手術，不但病沒有治好，而且加速了死亡；不過他所遺留下來的對科學的信念，實在令人欽佩。他自住入北平協和醫院以後，直到臨終的最後一刻，他始終相信醫院和醫生，沒有半句埋怨；他在臨終時還遺命將他的屍體捐贈給協和醫院作解剖研究之用。他這種為科學為真理的容忍和犧牲的精神，實在偉大。

## 七 三育並重的見解

梁氏雖然不是純粹的教育家，但他的教育主張頗多可取的地方，其中三育並重的見解，今天讀起來猶足發人深省。他以為中國古代的教育，原是「三育並重」、「德術兼修」、「文武合一」的，可



是自從倣效外國教育制度以後，不僅使中國固有的精神蕩然無存，而且僅僅襲取了外國的皮毛，連西洋教育的根本精神也未學得；因此，他極力主張恢復我國古代「智仁勇」三者並重的教育。

所謂「智仁勇」三者並重的教育，是和現代「智德體」三者並重的教育相似而不盡相同的。梁氏認為近代「德育範圍太籠統，體育範圍太狹隘」，不足包括人類整個心理；而健全的教育應按人類的心理有知、情、意三部分而分為智育（智）、情育（仁）、意育（勇）三方面，三者並重，才是圓滿的教育。他說：

「人類心理，有知情意三部分，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，我們先哲名之為三達德——智、仁、勇，為什麼叫做『達德』呢？因為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，總要三件具備纔能成一個人，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？孔子說：『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』所以教育應分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——現在講的智育德育體育，不對，德育範圍太籠統，體育範圍太狹隘——知育要教到人不惑，情育要教到人不憂，意育要教到人不懼，教育家教學生，應該以這三件為究竟，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，也應該以這三件為究竟。」

他這段話是說明圓滿的教育不僅應包括智、情、意三育，而且還要以達到智、仁、勇的完成狀態為理想，所謂完成狀態，就是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

如何才能「不惑」、「不憂」、「不懼」？梁氏說：

「怎麼樣才能不惑呢？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，想要養成判斷力，第一步，最少須有相當的

常識，進一步，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智識，再進一步，還要有遇事能斷的智慧。」

「怎麼樣才能不憂呢？……大凡憂之所從來，不外兩端，一曰憂成敗，二曰憂得失……『仁者』看透這種道理，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，肯做事便不會失敗，所以易經說：『君子以自強不息』，換一方面來看，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，幾萬里路爬了一兩寸，算成功嗎？所以論語說：『知其不可而為之』，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，還有什麼成敗可憂呢？……」

「怎麼樣才能不懼呢？……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，……意志怎樣才會堅強呢？頭一件需要心地光明，孟子說：『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』又說：『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慊焉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』……一個人要保持勇氣，須要從一切行為可以公開做起，這是第一著，第二件要不為劣等欲望之所牽制，論語說：『子曰：吾未見剛者，或對曰，申枨，子曰：枨也慾，焉得剛。』一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慾東拉西扯，那麼，百鍊鋼也會變為繞指柔了。」

他以為在知育方面，如果能夠具備相當的學識，則能明白事物的條理，辨別是非的標準，這樣自然能夠不惑；在情育方面，如果能夠看透成敗得失的道理，則能體會人己的合一，這樣自然能夠無所疑慮而做到不憂；在意育方面，如果能夠做到心地的光明磊落，不為劣等的慾望所牽制，則能見義以赴，不避危險，這樣自然能夠不懼。

## 八 理想國民的塑造

梁氏鑒於我國國民一般的缺點，針對時代和社會的需要，吸收東方和西方道德的特點，塑造了一個理想的國民的標準，他稱之為「新民」。這個標準不但在當時是有價值的教育，就是在今天，依然值得我們努力去實踐。

梁氏所望的「新民」有下列的特點：

(一) 要有公德心 新民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公德心。中國一般人一向只注重私德，而缺乏公德心。可是公德心比私德更重要，因為公德心是維持團體生活不可缺的；如果一個團體的國民缺乏公德心，這個團體的秩序就很難維持；如果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缺乏公德心，這個國家所舉辦的各種公共活動也很難發生效果。

(二) 要有國家觀念 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很淡薄，一般人只知道有個人、有家族、有天下，而不知道有國家。其實，國家比個人、家族和天下都重要；如果沒有國家，個人也失去了依附；國家一旦滅亡，個人也無法生存了。所以新民應該愛國家甚於愛個人，愛國家甚於愛家族和愛天下。新民應該有為了國家雖然犧牲個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

(三) 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 人生原就充滿了困難和憂患，假如沒有進取冒險的精神，就永遠為困難和憂患所制服；人民進取冒險的精神愈盛，其國家也愈強。

(四) 要有權利觀念 權利就是個人有資格享有某些合法的利益。當這些合法的利益受到別人侵犯的時候，我們應該依法力爭，以確保這些利益而不墜。如果大家都有權利觀念，就會各守本份，和尊重別人的合法利益。

(五) 要了解自由的真義 自由不是放縱，也不是不受約束；自由是和秩序、法律相伴而來的。一個人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首先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，服從團體的規則。遵守國家的法律，服從團體的規則，這些都是自由不可缺少的條件。因為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守法，他就不會侵犯別人的自由，這樣個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。

(六) 要有規律的生活 新民的生活是自治的。所謂「自治」，就是規律的生活。新民的飲食、起居和作息，都應該有一定的時間。

(七) 要認清義務 新民要認清納稅和服兵役是個人應盡的義務。現代的國家，一方面要靠人民納稅，辦理各種事業，以謀人民的福利；一方面要靠人民服兵役，以鞏固國防而保衛國家的安全。

(八) 要能夠自尊 所謂自尊，就是新民必須具備有不受威脅、不受利誘的獨立人格。

(九) 要有毅力 毅力就是堅毅不撓的精神。個人無論遭遇任何困難，必須不屈不撓，奮鬥到底

(十) 要能夠合群 優勝劣敗為人類和生物生存的公例，雖然優勝劣敗的原因不止一端，但能否合群卻是重要的原因。人類能夠生存到今天，不被其他生物所消滅，也就是合群的效果。中國人只有

個人沒有團體，形同一盤散沙，所以一遇到外來的侵略，就不能團結對外，這種惡習應該趕快改正過來。

(十一) 要做社會的生利分子 新民必須是社會的生利分子。所謂生利分子，並不是要每個人直接參加到生產事業裏去，凡是能夠保護生利的人，像官吏、軍人和醫生等，也都是社會的生利分子；凡是能夠增加人類知識，改進人類品質的人，像教育家和文學家等，也莫不是社會的生利分子。

(十二) 要有尚武精神 中國國民的體質一向十分文弱，當此列強逼境的時候，尚武精神尤其不能缺少。

(十三) 要注重私德 私德和公德並不是相對的名詞，而是相關的名詞。個人必須有私德然後才能有公德，聚有私德的個人，才能組成有公德的團體。私德醇美的個人，雖然並不一定公德完備，但只須推其私德，不難兼具公德；但私德惡劣的個人，必無公德，所以私德可說公德的先決條件。

(十四) 要具政治能力 一個政府是否健全，要看這個國家的人民有無行使政治的能力。要建立一個民主有效的政府，人民的政治能力尤其重要。

此外梁氏所論尚多；惟由以上所舉，已可看出他所塑造的理想國民，應該具有的各項人格修養了。

## 九 講學育才的晚年

梁氏早年從事教育的生涯不多，到了晚年從事講學育才，卻極為辛勤。他自民國九年從歐洲返國後，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針和態度，自此以後不再從事政治活動，專心致力於講學育才的工作。

他在民國九年曾為辦理中國公學捐募基金；又組織共學社，編譯各書；發起講學社，聘名哲講演。

民國十年他應天津南開大學之聘，在該校主講中國文化史。這年十月以後，又應京、津各學校的邀請，曾作公開講演七次。

民國十一年四月起，梁氏應各學校和團體的邀請，曾作學術講演二十餘次。這年春天曾在清華學校講學；八月末旬在南通中國科學社年會講演；十月下旬赴南京東南大學講學，因為講學過勞，以致患心臟病，但講演仍然沒有停止。此外，他為了謀求中國公學的發展，仍然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。

民國十二年梁氏發起創辦文化學院於天津，後來因為經費困難，創校計劃未能實現；他又和同志創辦松坡圖書館；七月主講南開大學暑期學校；九月起在清華學校講學。

民國十三年春，他在南開講學。

民國十四年九月初擔任清華研究院導師；這年就任京師圖書館館長。

民國十五年梁氏就任北京圖書館館長。同時仍在清華講學，並忙於三館館務和學術講演。

民國十六年梁氏就任司法儲才館館長，並擔任人生哲學一課。

綜觀梁氏的晚年，其講學育才的辛勤，較同時代的任何教育家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梁氏曾說：「戰士死於沙場，學者死於講座。」他可說是如願以償。

## 十 思想言論的影響

要舉出一個清末民初在我國學術界思想界盡力最多、貢獻最大和影響最深的人，我們不能不說那就是梁啟超先生了。他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，遠較他在教育上的成就為多。

梁氏在思想界的最大貢獻，是他所倡導的思想自由。他既不盲目於新學，也不固執泥古，他對於我國過去思想界各家思想受儒家思想的束縛，極為不滿；他認為這種儒家思想所形成的束縛，使我國二千年來殊少傑出的大思想家，即使有也只能託古而存，毫無獨立精神。所以他一生致力於提倡思想自由，力圖破除這種思想界的痼疾。清朝末年，我國思想界雖然粗率淺薄，但朝氣蓬勃，這不能不歸功於梁氏的倡導。

其次，梁氏對於新思想的輸入和宣揚，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。光緒二十二年他主編時務報，數月之間竟銷行達三千份，為我國自有報紙以來空前未有的現象。光緒二十四年又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，二十八年創辦新民叢報和新小說雜誌等，這些報紙雜誌對於開民智、振民氣，都有極大的影響。已故德劭學博的蔣夢麟先生曾在他所著的西潮一書中說：

「他（指任公）的『新民叢報』是當時每一位渴求新知識的青年的智慧源泉。」

「我就是千千萬萬受其影響的學生之一。」

新民叢報只刊登和發表梁氏著述的一部分，影響已如此重大，其他可想而知。

梁氏見解新穎，筆鋒銳利，感情豐富。他所發表言論的字裏行間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，凡讀過他的著作或聽過他議論的人，莫不直接或間接地、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他的影響。如果說梁氏是使中國思想走上現代化的功臣實不為過。我國國民革命的成功，他在鼓吹和宣傳上的功勞也不可沒。蕭一山所著的清代通史中有一段話說：

「……內地之宣傳，人心之趨嚮，大半皆任公之力。當余總角受書時，即曾讀其家喻戶曉之中國魂，而固不知有民報與革命也。以後再造共和，撲滅復辟，其遺徽更不可磨滅矣。」

世人多以保皇責備梁氏，殊不知革命的思想，尤其是在初期，多賴於梁氏言論的影響而能普遍深入；梁氏的政治思想，固然直接地興起憲政運動，實際上也間接地促成了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成功。